

■ 学术钩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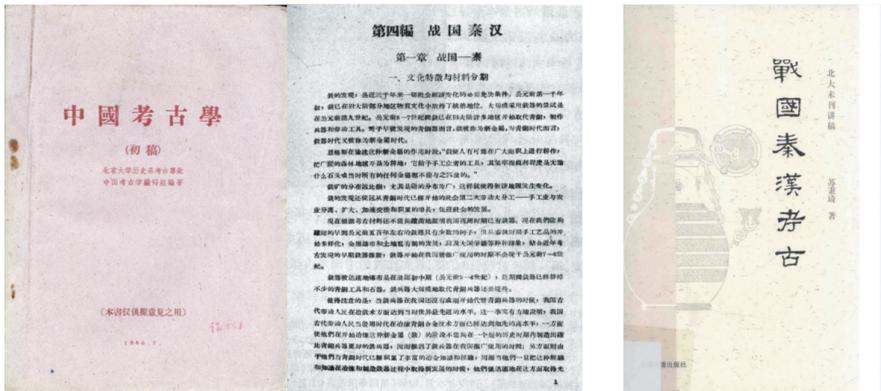
“战国秦汉考古”命名及课程溯源

郝丽君

“战国秦汉考古”是中国考古学断代考古的组成部分，高校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体系中也有专门的“战国秦汉考古”课程。关于这一考古分支命名和课程来源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设考古专业的北京大学有直接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高等教育按照苏联模式实施“专才教育”，进行行业归口的专业教学制度和课程设置，作为文理综合大学的北京大学仿照莫斯科大学建立各学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先生受委派来北京大学，与向达先生在历史学系下筹办考古专业，苏先生出任考古专业主任并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按照最初的教学计划，考古学专业主要开设课程——“考古学通论”“考古方法”“中国考古学史”“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由郭宝钧、苏秉琦、宿白三位先生共同讲授，苏先生讲授“秦汉考古”部分，此时的“战国时期”尚归在“商周考古”部分。1956年“中国历史考古学”分成“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三门独立课程，据北京大学主编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可知，此时的“战国时期”内容已经从“商周考古”转入“秦汉考古”，但课程仍称作“秦汉考古”。1958年，已经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的尹达先生受邀到北京大学作报告，他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考古专业师生响应提出撰写《中国考古学》教材的任务，计划包括六个部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南北朝至宋元时期、资产阶级学术批判。战国秦汉部分作为第四编，参与编写的成员有苏秉琦、祝广祺、高广仁、王鸿玲、高建民、杨式挺、俞伟超、徐光冀、马耀辉等多位师生。1960年北京大学铅印的《中国考古学》教材第四编已直接命名为“战国秦汉考古”。

1953年至1965年的十余年时间，“秦汉考古”（后改为“战国秦汉考古”）课程一直主要由苏秉琦先生讲授（1962年至1964年俞伟超先生参加讲授），“战国秦汉考古”课程的目录和内容设计均由苏先生亲自指导和参与。苏秉琦先生在其1959年手写的该课程讲义中说战国秦汉是相对独立的。将战国与秦汉合并有一定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当时流行的“封建论”和“铁器时代”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流行的年代，受到苏联的影响，当时“商周考古”也被叫作“奴隶制时代考古”，“秦汉考古”也叫“铁器时代考古”，春秋战国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当时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意见被学界广泛推崇，他在著作《奴隶制时代》（1952年）、《关于中国古



1960年《中国考古学》教材封面及战国秦汉考古部分内页（分别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官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战国秦汉考古》第20页）

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960版《中国考古学》战国秦汉考古部分

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1959年）中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强调战国已拉开了封建制时代的序幕。1955年第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中国考古学》油印教材“秦汉考古”课序论“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一节强调“中国考古学上的铁器时代的开始约在春秋战国之间。”这也是基于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铁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认识，尤其是辉县固围村、邯郸齐村、长沙识字岭战国墓葬出土的铁农具和兵器，金相检测显示它们均使用块炼法冶炼，表明在大规模使用冶铁器更早的“春秋战国之交还处于铁器时代的最初阶段”，铁器的使用对春秋战国间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变革。

无论是苏秉琦先生个人的课程讲义还是组织撰写的教材，有关“战国秦汉考古”的观点和意见是一致的。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教材于1970年至1974年重新修订作为内部讲义用，在1970年代随着多所高校陆续创办考古学专业后被拿来翻印参考教学，影响至全国。

梳理我国早期发掘及整理出版的考古材料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山彪镇与琉璃阁》《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洛阳烧沟汉墓》等），我国许多考古学的经典理论和课题在这一阶段的考古成果中被实践确立。如苏秉琦先生在对宝鸡

斗鸡台沟东区西周、战国、秦汉的陶鬲的研究中引入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先史考古方法论》（1937年滕固翻译版本）关于器物类型学的方法，结合墓葬形制进行了文化分期，这一方法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的墓葬整理中继续实行，他通过考察随葬陶器组合，在层位基础上对260座东周墓葬进行了分期；而对长沙郊区战国至秦汉145座墓葬的整理开创了考古材料研究古代葬制制度的先河，陈公柔先生主要根据这批材料，通过梳理《仪礼》等古代文献撰写了《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葬制制度》；而郭宝钧先生编写《山彪镇与琉璃阁》时首次提出“列鼎”的问题……

纵观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课程讲义的目录和内容，苏秉琦先生对于战国秦汉考古课程的主要贡献在于规划设计了课程大纲体例、强调考古材料年代和分期、用类型学的方法处理材料、注重文化分区，这些理念和方法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发展，而背后的思考也正是苏先生工作实践的结果，正如他抗战时期避居昆明整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时最直接的疑问——“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批墓葬材料如何分期断代？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特征如何？这些遗迹遗物现象背后的史实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理念和方法建立的又一个起点。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史前墓葬：仪式与社会(无锡·2025)”学术研讨会纪要

8月25日至28日，众多青年学者齐聚无锡，以史前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为着力点，围绕五个议题，通过探讨葬仪及其承载的墓葬情境，反映的社会组织、精神信仰等来研究史前社会图景。

议题一：发现与思考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马强研究员发言题目为《田野考古的几点新认识》。经过多年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总结出五点新认识：黄土高原古今地貌变化不大，距今5000年的仰韶时期就已经形成现在的这般地貌；黄土高原上村落居住存在古今重叠的现象；通过对墓葬填土堆积形态的系统分析与多学科手段相结合，基本实现从建造、下葬的环境背景的系统性重建；创新使用“破边法”发掘技术，了解复杂祭祀遗迹的建造使用过程；陶片拼对探索新方法，打破单位限制，进行整体拼对，并详细记录跨单位拼合信息。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饶华松副研究员介绍了九江茅麦岭遗址群新石器晚期墓地发现与发掘。岭头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自2022年发掘至今，在遗址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清理41座墓葬，方向以南北向为主。随葬品多为陶器，分属于崧泽晚期和良渚晚期两段。同时，在遗址中部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加工区。茅麦岭遗址群岭头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对明晰赣北地区族群格局、历史发展、文化特征意义重大，该遗址对建立赣江流域新石器文化谱系、认识区域族群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为研究崧泽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及去向提供重要参考。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邵栋副研究员主要介绍了无锡地区发掘的史前墓葬的形制特点和随葬品情况。马家浜时期的墓葬与其他功能混杂分布。马家浜文化晚期聚落初现功能分区，专门的墓葬区已经显现。崧泽时期墓葬区形成独立的分布区域。总结来看，马家浜文化的居址、墓地混杂分布，出现单一紧密型聚落，到马家浜晚期，特别是崧泽时期，在大的聚落内，各个功能区独立分布，聚落社会从紧密型向疏松组合型发展，体现了社会复杂文明化的进程。

议题二：信仰与精神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广明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史前葬仪中的“共祖”意识》。他认为共祖意识的形成是一个跨越数千年的渐进过程，其时间节点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演进高度契合。在比较宏观视野下，血缘与地缘是塑造国家形成道路的核心变量。以中华文明为核心代表的东方呈现“血缘为根、地缘为体”的融合路径，国家是血缘共同体的地缘扩展；以古希腊-罗马、近代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则展现“地缘为先、血缘退隐”的突破路径，国家是地缘共同体对血缘纽带的超越。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徐峰教授发言题目为《史前墓葬葬仪——以龙形动物遗存为中心》。他首先对“仪式”进行了定义，仪式是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价值和意义的行为活动，这些行为动作通常不具备直接的工具性目的。然后分析了考古

发现的“龙形”遗存，认为史前的“龙”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生存方式不断适应的产物，其形象塑造纷繁多变，是一种稚嫩期的典型表现。

议题三：葬仪与遗存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谊时研究员围绕海葬等遗址的典型墓葬讨论齐家文化随葬玉石器，他认为齐家文化墓葬内随葬的白色石块可能和矿工的身份有关。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葛昕炜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厚胎高柄杯与史前葬仪实践：崧泽晚期与大汶口早期的墓葬考察》。他认为高柄杯在重复的葬仪活动中似乎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使用标准，是丧葬观念物化的一种体现。高柄杯的分布情况表明至少在崧泽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阶段，东南沿海区域已经形成具有一定成熟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部分文化认同。

议题四：仪式与制度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张建副教授发言题目为《仰韶文化葬制初探》。通过对仰韶文化典型墓地与葬制分析，他认为仰韶文化葬制呈现出六个特征：首创墓区制度；墓地规划突出礼制；二层台、棺椁制度出现；倡导简葬，随葬品礼制基本确立；装殓制度进一步发展；葬祭仪式制度不断发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贾一凡副研究员发言题目为《中原腹地龙山时期葬制初探》。他认为中原龙山时期已经形成了等级比较严格的葬制制度，礼器组合比较固定，殉人和葬具使用制度初现。中原龙山时期的葬制观念继承了该区域前一阶段的“重贵轻奢”的葬制理念，也兼具东、南方地区“以量取胜”的因素，形成了具有中原风格的“重礼轻奢”或者“礼重于奢”的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助理研究员尝试从海岱龙山文化大墓的葬仪内涵入手，理解早期葬仪中棺椁空间的象征意义。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早中期，海岱地区龙山社会延续了大汶口时代多中心区域竞争的面貌，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海岱史前墓葬中出现多重棺椁的现象，反映了该区域多层同构的社会关系特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禄红副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四川宣汉罗家坝M83：年代、葬仪传统及其学术价值》。罗家坝M83的年代基本上在战国早期晚段到战国中期之间，M83使用棺槨，是一座男女合葬墓，脚端有殉人，男性墓主脚端叠压放置龟甲和鹿角。M83为巴蜀地区青铜时代物质文化研究提供珍贵的基础资料，对于巴蜀文化的年代序列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实证文明交往交流与交融、深化巴蜀文明进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锦琼副研究员发言题目为《殷墟墓葬的空间结构初析》。他分析了殷墟墓葬的墓室内各个空间在葬制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提出椁（棺）室内和椁（棺）室外有着不同的特征，椁内或者椁室内是墓主生前所在的空间，椁（棺）室外，则是他的后人在完成葬制过程中对他进行祭祀

的空间。此墓葬空间的二元对立是生者对死者复杂意识的集中体现。

议题五：文化与社会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胡颖芳副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墓葬视角下的太湖西北部至宁镇地区的史前文化互动和交流》，聚焦太湖西北部与宁镇地区，认为太湖西部与宁镇地区的关系更为密切，与马家浜文化几乎同时的骆驼墩文化可能源于受淮河流域双墩文化影响的丁沙地—蒋家墩遗址文化类型，到崧泽文化早期阶段，骆驼墩文化直接发展为三星村—北阴阳营文化，这与东部的崧泽文化是两条并行发展的文化脉络，至崧泽文化晚期，本地区已经被崧泽文化扩张的浪潮所吞没。整体上，距今7200年至5300年，太湖西部、宁镇地区与周边的文化交流较为频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冬冬助理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基于墓葬资料对史前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以彭头山和城头山遗址为例》。利用基尼系数对我国长江中游彭头山—城头山遗址史前墓葬中的财富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彭头山—城头山遗址史前墓葬财富不平等的历时性轨迹是非线性的，两个遗址财富不平等最强的相关因素为水利工程，权力在财富聚集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且不同权力符号表达的财富属性也有很大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范梓浩助理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城头山墓葬反映的大溪—油子岭社会的两次变革》。他深入分析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至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墓葬与社会，研究表明大溪一期至四期，城头山社会经历两次变革，大溪一期无特殊遗物与仪式，未见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等级表现出平等状态；大溪二期极少数社会精英使用特殊遗物与仪式，通过特殊遗物与仪式昭示等级；大溪四期特殊葬俗为中高等级人群普遍使用，除朝南墓外，其他墓向无显著差异，阶层固化不明显，大溪四期通过葬俗限制身份，随葬品数量表达等级。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党继蓉博士生发言题目为《芮城清凉寺墓地“毁墓”现象再探讨》。清凉寺三、四期大规模“毁墓”现象，实际延续时间较长，不少低等级墓葬也被“毁”，“毁墓”位置和方式、被“毁”墓葬的分布、墓主性别等都有一定规律性，这些更符合“扰乱葬”的特征。这种葬俗并非中原地区传统的埋葬习俗，可能受到了甘青地区的影响。

最后，山东大学王芬教授作总结发言，分享了自己的三点体会。第一，全面和系统。此次研讨会内容非常全面和系统，能够搭建起一个从点到面到系统的全貌性认识。第二，前沿和深入。这次研讨会虽然有很多介绍材料和跨区域跨时代综合性研究，但是通过这些研究能够看到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趋势。第三，目前可以从技术操作层面和理念方法层面来认识墓葬研究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需要关注以下方面。首先是需要再次强调聚落考古，尤其是聚落考古的空间性；其次是墓葬出土器物组合；三是关于仪式和社会。仪式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是从聚落考古当中引申出来的过程和关系研究，最后还是回归到人与社会的研究。

(执笔：白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公众考古

实验考古与研学、文创

黄洋

实验考古是通过实验方法解决考古学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体系。《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将其定义为：“考古学研究分析的一种模拟方法论。是根据考古资料提出解释的假设，尽量按照考古资料时代的技术条件，进行复原模拟实验，以得到实验结果验证假设，从而推断考古遗存的功能与性质。”该定义着重强调其核心在于验证关于遗存功能与性质的假设是否成立，是运用“演绎法”进行考古研究的典型路径。

从更加微观的视角来看，实验考古是以科学发掘的考古材料为依据，通过模拟符合时代特征的技术手段，实验和复原考古材料的生产、使用、废弃、埋藏和埋藏后改造等过程，用于重建某种技术或社会形态。重点是利用实验和复原来模拟考古材料的各种动态过程。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目标是进行人类社会复原研究，这与实验考古以“复原”为核心的理念高度契合，使其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笔者数年前在参观南阳黄山遗址发掘现场时，看到一名考古技工使用竹弓麻绳和解玉砂对一块独山玉料进行线切割解玉操作，以求利用这种传统方式模拟取得独山玉片的过程。技工老师向笔者展示了线切割解玉所形成的圆弧形痕迹，并与有类似痕迹的古玉进行对比，使笔者直观感受到了实验考古的魅力。彼时，南阳黄山遗址发掘领队马俊才老师还未正式提出该遗址是南阳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生产贸易中心的研究结论，但从现场开展的推断实验过程来看，他们已对该结论有了深入研判，并通过实验考古等方法对其进行系统性科学验证，以求复原南阳黄山遗址玉器生产的技术特点和社会形态。

实验考古成果的应用贯穿考古研究全过程，同时在展示领域，尤其是在博物馆的应用更为普遍且广为人知。博物馆陈展常常借助视频等多媒体手段，模拟展示各类文物的生产或使用过程，如泥条盘筑法制陶、小口尖底瓶汲水、失蜡法铸铜、玉石器制作、古建筑营造、器物功能演示等，本质上都是对实验考古成果的高度提炼和通俗化展示。近年来热度持续攀升的建筑考古，也将实验考古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考古工作者依据古建筑基址数据和历史文献资料，可将已经湮灭的古代建筑进行复原，通过制作模拟其建造过程的动画或等比例缩小的实体模型，对完整展现古建筑营造技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实验考古在考古研学中的引用

研学，全称是研究性学习，最初的定位是以学生为中心，拓宽传统教学理念、方法、模式、标准的实践性学习，强调直观感受和亲身体验，是在实践中、在探究中学、在体验中学，简言之就是“做中学”。在考古热大背景下，随着研学的不断推广，考古研学已成为研学活动中广受瞩目的重要内容，研学体验者也不再局限于学生，进而扩展至广大文博爱好者。

考古研学又可以被看作是公共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面向公众展现考古成果的重要手段，想要呈现内容翔实、严谨丰富、沉浸感强的考古研学活动，动手实践为核心环节，目前较为成熟的体验活动主要有在模拟探方勘探、发掘，体验手工制陶坯，器物彩绘，器物修复，制作拓片等。然而，相较于严谨、系统的考古研究，当前的考古研学往往局限于某些环节的浅层体验。部分体验活动甚至借助现代工艺或材料，导致参与者可能接触的是不符合科研要求的“假体验”，难以真正达成通过实践深入理解考古研究内涵的目标。

实验考古旨在复原工艺技术和形态形态的实践行为，与考古研学追求亲身体验研究过程的实践行为，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两者都致力于利用传统技艺再现文物及其背景，在科学的实验考古基础上开展的考古研学体验，兼顾严谨性与沉浸感，能切实达成“做中学”的目标，让参与者获得真实的考古研究体验与认知。

因修建三门峡黄河大坝，1957年山西芮城永乐宫面临整体搬迁，为了确保珍贵的永乐宫壁画成功迁移，中央美术学院和美院华东分院国画系高年级的老师和学生们陆续到达，历时近一年对永乐宫壁画进行了原样临摹，最大限度地探索传统材料、工艺和效果，以防万一在迁移过程中有所损失，能够提供充足的恢复依据。这场轰动全国文博界和艺术界的壁画迁移行动，本质上就是一次规模宏大且意义深远的“实验考古”实践。时至今日，基于当年那场实验考古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临摹永乐宫壁画已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考古研学课程体系，吸引着全国各地中小学、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学生以及文博爱好者慕名而来。

考古研学体验应合理引入并有效结合实验考古中易学、易操作的部分过程，成为考古研学中沉浸式体验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使研学参与者沉浸其中，实现寓教于乐；另一方面推广更多专业的考古学内容实现科学普及，达成公共考古的一般目标。

用实验考古的思路开发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源于文化主题，经过创意转化后形成商品，属于能够普遍产生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体系。近年来，文创产品市场火爆，尤其是以古代文物为创意源的文创产品更是频频推出，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文物类文创产品的良莠不齐。每次亮眼创意的推出，会被迅速跟风抄袭，复制成本低；创意程度较浅，往往局限于文物元素的生硬引用；质量堪忧的低质旅游纪念品充斥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按照古建筑材料构件结合方法等比例缩小的古建筑模型，成为近年来文创产品开发的宠儿，它凭借对木构件的精准复原、对营造过程的逼真模拟以及精良的产品质量，使消费者得以深度体验古营造技艺，并收获高品质的模型成品。此类产品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兴趣，也开辟了文创领域的商业蓝海。

古建筑模型的成功背后，是文创产品开发者深厚的古建筑研究基础，此类文创产品的开发前提是要对“被复制”古建筑构造和模数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开展大量复原拼装实验，经反复验证和调校最终诞生成品推向市场。古建筑构件纷繁复杂、构造精密、数据要求严谨。若未经充分的实验验证，最终的文创产品极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使一些所谓的古建筑模型仅停留在对古建筑外形的模仿上，难以触及技术难度较高的构造方式等方面，致使消费者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大打折扣。

古建筑模型类文创产品开发门槛较高，虽然其开发过程中的实验验证目的与纯粹的实验考古研究有所不同，但同样需要严格遵循实验考古的复原验证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建筑实验考古过程的模拟与再现。购买并拼装此类文创产品的消费者，实质上也是在遵循实验考古的部分规范，完成了古建筑的微型模拟复原过程。

借鉴实验考古的思路和部分标准、要求来开发文创产品，从消费者角度考虑，将使文创产品在可实践性上得以提高，能够在保证产品美观、有趣、可互动的同时，通过其高品质和稀缺性赋予其一定的收藏价值；从开发者角度考虑，高质量文创产品不仅能提升经济附加值，更能为文创品牌建设奠定基础，掌握实验考古精髓的开发者思路更开阔、开发能力更强，有利于开发涵盖高、中、低端文创产品的完整体系；从科普角度看，以实验考古为指导开发文创产品，能有效弥合科研与科普的鸿沟，加速科研成果的大众化传播，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实验考古作为运用“演绎法”进行考古研究的重要手段，其高度强调实验与复原的特点奠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同时，在考古研学、文创开发等科普领域，它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深入了解并应用实验考古的精髓，对于推动考古科研成果有效走向大众，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